

被“许国璋英语”遮蔽的许国璋

许国璋这个名字太响亮了,响亮到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在中国似乎还有一种英语叫“许国璋英语”。这个名字又太陌生,陌生到不同于他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查良铮、巫宁坤等,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仿佛这是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真人。而他自己最不愿意被人定义为“英语专家”。他说,专什么呀?英语不是学问,英语是工具。英语学得好就是学问,那英国美国街上走的都是学问家了?

“外人只知我是英语教育家。其实我自认我首先是语言哲学家。我是个哲人。”他如此对自己的弟子说。

“许国璋英语”

“许国璋英语”起源于1961年由周扬主持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当时决定英语专业教材1~4册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编写,许国璋任主编。北外英语系的张道真、马元曦、祝珏和张冠林等参与编写第一二册,刘承沛、周谟智、夏祖焯、王晋熙等参与编写三四册。

每篇文中都经许国璋反复修改润色,无不带有鲜明的“许国璋特色”。冰心之女吴冰曾写道,北外英语系都知道许国璋编书,写文章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认为无论外国、中国学者的英文都有可改进之处。

1962年,8册《英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套自编的重要英语教材。教材5~6册由北京大学的俞大纲任主编,7~8册由复旦大学的徐燕谋任主编。北外英语系的王佐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李赋宁和外交学院的吴景荣任1~8册的审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流溪1964年考入暨南大学外语系,上课用的就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第一册。第二学期,刚开始学第二册,毛泽东关于教学改革“春节谈话”传达下来。此后,这套《英语》作为“资产阶级教材”不用了。但许国璋所编前四册是基础教材,且选材精当、语言地道、结构合理(李赋宁语),适于成年人自学,在英语爱好者中不胫而走。

1972年,在王宗炎任副教授的广州外国语学院,有人建议:从南方放一枚“远程导弹”轰击北京的许国璋。问题是谁能拿出强有力的批判理由呢?没后来“批许”忽然不提了,原来是党委张书记的女儿说:“许国璋不要批,他的教材编得好,我看得懂,跟得上。”

后来在英语教学界与许国璋以“南王北许”齐名的王宗炎说,这让他想起一句话,公道自在人心。

“文革”结束后,英语专业面临一无大纲、二无计划、三无教材的“三无”局面,用教师们的话来说就是“等米下锅”。《英语》的修订再版被提上了日程。

商务印书馆外语室编辑朱原参加了组织工作。据他回忆,商务印书馆承担费用,在西郊一个饭店租下两间房。许国璋指定南京大学的罗长炎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的张永彪做助手(后又增加了祝晔瑾),对62版前四册进行了修订。原教材体例不变,只是对不合时宜的课文和练习进行抽换。这套教材改编重印后,不仅大学英语专业,很多大学公共英语课和社会上的英语补习班也在使用,一时间洛阳纸贵。

1979年,陈原复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一个冬日早晨,他去位于王府井的商务印书馆上班,见大楼门前的人流从王府井一直排到灯市西口,都为买“许国璋英语”,第二天电台开播。陈原吩咐发行部负责人在楼外摆开几张桌子卖书,并调卡车到西郊仓库去拉货。大约两个钟头光景,几千本书销完。

随着自学考试兴起,“许国璋英语”销量越来越大,到80年代末,年销售量已达30万册。

朱原说,教材每课后面都有注解,朱原曾向许国璋建议,注解非常重要,能不能专门做个索引方便读者查阅。他还举例说,当时张道真出过一本英语语法,也做过索引,不需要本人动手,可以由出版社找人来做,结果许国璋说“你怎么拿我跟他相比”。

新编许国璋英语

90年代初,北外所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急需能真正打开局面的重磅图书。时任外研社常务副社长的李朋义多次恳求许国璋,希望他能支持本校出版社,将《英语》放在外研社出版。

后来任外研社社长和北外副校长的李朋义曾是北外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告诉记者,读书时他没上过许国璋的课,但常去听讲座。许国璋有句名言:

“Do not come to my lecture without knowing ten thousand words.”(没有一万词汇量不要来听我的讲座)。李朋义开始只有一两千词汇量,去了才发现有的地方真的听不懂。许国璋英语地道,旁征博引,风趣幽默,不管听懂多少都是享受。

1980年,国家通过了《高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同年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王佐良任主任委员,许国璋任副主任委员兼英语组组长。编审委员会成立了北方、南方两个办公室,李朋义刚从北外毕业留校,分在外研社,兼做北方办公室秘书。在外研社,刚毕业的大学生做许国璋文稿的编辑工作还不够格,李朋义主要做校对。他说,许国璋写文章改动多,红笔改了蓝笔改,绿笔改了黄笔改,有时很难辨认。有的编辑不敢去问他,怕他反问“你这都看不出来还怎么做编辑”,李朋义跟他熟悉,敢去问,其实许国璋都会耐心地解答。

对李朋义的请求,许国璋表示愿意将正在编写的《新编许国璋英语》交由外研社出版,但新编教材周期太长,李朋义建议在《英语》每章节前加上“导学”,后面再附上“自学辅导”,与原版有区别。许国璋同意找商务印书馆协商。他说:“外研社是我任教大学的出版社,现在需要我的支持。再说,别人是养儿防老,我要出书防老。”商务印书馆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1992年,《许国璋<英语>》由外研社出版,当年外研社的利润就增长了几百万元,出版三年共发行近100万册,10年发行量达700万册,是外研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图书之一,使外研社迅速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

1993年,许国璋花费六年、几易其稿编写的《新编许国璋英语》由外研社出版。许国璋为每一课写的导学都有个性。如第二册第二课《新加坡》,他写道:新加坡在世界经济上的重要性绝不仅仅是一个转口港,它的立国一靠稳定,二靠科技,三靠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每课的背景知识解析尤其带有许国璋对英语的宽阔视野。《新编许国璋英语》第一二册出版发行了20多万册。1993年下半年后,许国璋身体不适,加之销路不如“许国璋英语”好,后两册没有再编写出版。

我把整个身心投入了进去

许国璋曾说,“许国璋英语”大行其道只表明英语界的落后,他的旨趣已转向语言哲学方面。

1984年末,69岁的他卸下北外英语系主任之职,组建外国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同时任北外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这本学术刊物发行量最高时达7.5万册。许国璋曾说:“I put my heart and soul into it.”(我把整个身心投入了进去。)

他为这本刊物撰写了多篇论文和书评。1986年3期上发表了他为金岳霖的《知识论》所写的书评。《知识论》是金岳霖写成于1948年的70万言巨著,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真正读过的人少之又少,连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王宗炎都说,《知识论》是博大精深的书,其中有许多专门术语,又有些过时的语法,读者不易懂,如那句著名的话“在这里我们只把语言视为收容与应付所与底工具”简直像“天书”。

这样的“天书”,许国璋不但懂,而且觉得“如此普世又如此亲切”,让他为之神驰心醉,掩卷叹息。对那句最难懂的句子,许国璋注解,“所与”是名词,意即given circumstances(给定情境),“收容”是对此的认识和保存,“应付”是对此的反应和处理。王宗炎说,经许国璋加以注释后,便觉得涣然冰释,怡然理顺。

许国璋多次说,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要打通,中文系不要只讲训诂、音韵、汉语语法,外文系不要只讲外国语言学派的论点,把自己局限于小天地之内。

许国璋还为《外语教学与研究》撰写了18篇带着

浓厚“许氏印记”的“编者的话”。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在4月的“编者的话”中,许国璋以一位语言学家的独特视角,盛赞南方谈话证明了语言的力量可以“大得惊人”,并能“收言后之果”,即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他提出,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中国外语界一要自省,二要强化。“五十年代以后第一批外语人才出山,我们不曾听见培养出英国通,美国通,法国通,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国际法专家,海事法专家,保险法专家,只听见培养出翻译干部。”他说,如果不反思“翻译干部万能论”,就是陷于困境而不知自拔,背于时代而不知转身。

曾有一段时间,《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人员有的滞留国外,有的萌生去意。1992年底的一天晚上,许国璋把王克非叫到家中说:“答应我,不要离开我们这个刊物。”王克非郑重答应了。王克非从小腿有残疾,参加1977年高考和之后五次研究生考试体检均未过关,许国璋力排众议将他录取为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守着对许国璋的承诺,如今他已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工作30多年,担任主编22年。

“许老”

英语界都知道,北外曾有“一老二公”。一老,即许国璋;二公,即王佐良、周珏良。三人同出一门,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同班同学。

许国璋是1936年秋从上海交大转学到清华外文系的。同班李赋宁很快发现,许国璋英语水平高出同学,他词汇量大,口语流利,作文句型和修辞多变化。来时他德语有一定基础,能读懂歌德的散文原文,学法语后很快能读懂莫里哀和巴尔扎克,能用法文写读书笔记。四年级时,叶公超教翻译课,让学生翻译《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他对许国璋的译文最满意,认为颇似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文笔。许国璋酷爱文学,尤其钟爱雪莱,在同学中得了“雪莱”和“爱丽儿”(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小精灵)两个外号。

谁也说不清,“一老二公”的说法是如何通行起来的。李朋义认为,可能主要因为他们的专业之别,“王公”和“周公”的专长在文学,“许老”在语言学,但是他们三个人在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上又是通的,无论语言还是文学功底都很好。

北外英语系50级的庄绎传告诉记者,许国璋的发音是标准牛津音,说起话来句子很长,喜欢用复句,一个套一个,学生们知道无法模仿,只能深深地佩服。

1951年进北外英语系的胡文仲说,许国璋对于新鲜事物总是抱有极大的热情,60年代中期社会语言学在国际学术界刚刚确立地位,许国璋已经注意到它的重要性和潜力,率先为研究生开了这门课程。

在1976年进入北外的吴冰眼里,许国璋和她母亲冰心那一代老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时刻记着自己是个通晓外语的中国文化人。许国璋常说,教学生不是“英语教学”,是“英语教育”,是以英语为工具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育心智,你要跟我说话,我首先看你有文化内涵,否则我一个教授来陪你练口语?

许国璋说,要迎接知识的挑战就要阅读,两万词汇是只少不多的。只有一万二,只能看一般的书,没有两万词汇量谈不上真正高深的研究。

许国璋的阅读习惯始于中学时。1932年淞沪抗战时期,在苏州读中学的他回到上海家中,只能看书。他开始借助词典读《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这是英国作家兰姆姐弟的经典改写版本。总查词典辛苦又乏味,他就尝试着丢开词典大胆读,被神奇美妙的文学故事引上了读书道路。因此他现在看到中小学英语教科书上读来毫无味道的文章,总是心痛。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